

从“拿来”到融入

——基督人格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 张舟子

19世纪中叶以降,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日渐加深,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汉译《圣经》的发行量持续增加。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少有真正的基督徒,但受到基督教影响者却屡见不鲜,粗略统计就达几十位之多,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作家都受过基督教的某种影响。一些作家从中“拿来”了基督耶稣的博爱、宽容和牺牲精神,塑造出一系列具有基督人格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从英雄走向凡人,其审美形态从崇高走向平凡,从中可见基督教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日益深入的轨迹。基督人格作为中国作家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的思想资源,在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后,最终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潮,成为中国文学自身的血液。

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世人,虽遭到误解甚至罹难却是在所不辞,这种至大的博爱精神是他人格中最为动人之处。基督教影响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中国作家塑造出一批具有基督人格的人物形象。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表现出基督精神的人物是《药》中的

夏瑜,其作者鲁迅并非基督徒,对基督教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反感,但他对充满献身精神的耶稣还是深深理解并充满敬意的。由此,他一方面说“‘圣经’两字,使人见了易生反感”,另一方面又称希伯来文明“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在《药》中塑造的夏瑜就是一个明显具有基督精神的形象,夏瑜牺牲的经过几乎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故事的翻版。许地山笔下的春桃是现代文学中又一个具有基督精神的人物形象。春桃和刘向高、李茂三人的共同生活表面上违背了基督教对一夫一妻的要求,但春桃的行为在深层动机上却充满了牺牲、博爱和奉献精神,她和两个男人同居并非淫乱,而完全是出于无法舍弃残疾的李茂,“民间的仁义和宗教的慈爱混合在一起,在一个拾破烂的女子身上表现出来”。在春桃这个形象中挖掘出内在的宗教精神,可以说是许地山的一个独特贡献。80年代,张贤亮又在《绿化树》中塑造出一个在精神和夏瑜、春桃一脉相承,形象上和春桃前后相映的女性形象马缨花。马缨花是一个年轻的未婚女子,却带着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女孩;更令人奇怪的是,在那样一个粮食严重缺乏的年代,她总能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粮食,以致被人含有贬义地称为“美国饭店”。在小说中,当章永璘受到马缨花的帮助在精神上开始复苏时,从内心将她比作“拉撒路”。值得深思的是,张贤亮在描写一个深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的人物时,为何把她比作一个基督教形象?也许,更为熟悉基督教文化的张贤亮觉得,只有基督教形象才能更准确地揭示出马缨花的精神实质。夏瑜、春桃和马缨花的形象看起来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然而,他们表面上与社会的要求相龃龉,遭到人的误解、嘲笑甚至杀戮,但却内心纯洁,充满了牺牲和奉献精神,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一致的。正是一种深沉的宗教精神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底蕴,使之具备感人的力量。

夏瑜、春桃和马缨花的形象虽然都富于宗教精神,但他们与其

所处环境的紧张程度却存在很大不同,这些不同折射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的逐渐深入。夏瑜的精神境界最高,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最为紧张,冲突最为激烈,结局也最为悲惨。鲁迅一方面对夏瑜之崇高精神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一方面又在其坟头添了一个花环,以表示对夏瑜的敬意。在《春桃》中,小说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刘向高和李茂之间,以及两人的内心。在两个男人看来,三个人的特殊生活使李茂成了“王八”,而刘向高则背上了霸占别人妻子的罪名。为了生存,两个男人最终无奈地接受了春桃的选择。许地山在处理这样一个素材时,突出了两个男人以及春桃之间的相互关爱,春桃的抉择完全是出于对李茂的同情,充满了主动牺牲和奉献的博爱情怀,表现出崇高的基督精神。与夏瑜不同的是,春桃的行动收到了实际效果,被拯救的李茂和向高最终理解也接受了她的牺牲和奉献,李茂由于春桃的奉献得到了生活的保障,作者通过春桃形象对基督博爱人物的实际效果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在《绿化树》中,马缨花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显得更为温情,作者给了她更多的辩护,周围很多人看到了她的精神实质,也给予了她更多的谅解。马缨花牺牲和奉献的对象章永璘对她更是充满感激之情。对于这种不惜遭人误解、勇于牺牲自己而去拯救别人的举动,小说表示了更高层次的理解和称赞。

从夏瑜、春桃到马缨花,现当代文学中这些显示出基督人格的人物经历了一个由英雄到凡人的演变过程,而他们与周围社会的矛盾冲突不断弱化,其救赎精神的社会效果也不断明显,则显示了作家对基督人格的社会作用由怀疑、认同到肯定、赞扬的变化,进而折射出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逐渐深入。从中可见,基督人格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间基督人格被更多的作家接受,逐渐成为新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日益普遍的影响。

如上所论,鲁迅一方面对基督教表示反感,一方面又看到希伯来文化“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的事实,因此主张艺术家应该了解基督教。鲁迅显然是看中了基督博爱、牺牲的精神,力图从中找到可以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资源。对于基督教,鲁迅完全站在其改造国民性的立场上,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的方式。其实,不仅鲁迅,新文学之初受基督教影响的许多作家都是从其教义的某一点发现了中国人所缺乏的某种精神,因而予以大力歌颂和提倡。许地山的情况与鲁迅有所不同,他大约十岁左右就受洗做了基督徒,后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又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宗教史及比较宗教学。可以说,他从情感和理智上受到基督教的双重影响。许地山还受到道教和佛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宗教已构成他思想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宗教精神几乎成了他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当然,由于对基督教更为熟悉,对于许地山来说,基督精神已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是体现在普通人身上的实际行为,他许多小说的主人公都表现出鲜明的宗教精神。到了30年代创造《春桃》时,他从一个捡破烂的普通女子身上看到崇高的基督精神,将她塑造成具有基督人格的形象,这既是他艺术上的一次突破,也显示出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进一步深入。

50年代以后,由于人们对基督教存在偏见,对它普遍采取了否定甚至批判的态度,基督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一度暗昧不明。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这种影响又重新得以显现。这个阶段,基督人格对于文学的影响呈现出了新的形态,作家们好像不再着意追求从基督教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甚至表现出摒弃宗教的姿态,但是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仍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基督人格的影响。张贤亮塑造了马缨花形象的《绿化树》恰恰是他题名为“唯物者启示录”的系列小说中的一篇,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意味深长的。“唯物者启示录”本意在于描写一个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

识分子艰难地成长为唯物主义者的过程,但是,将主人公从沉沦中拯救出来的女性形象却是充满基督精神的人物(在同一系列的另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黄香久形象完全可以视为马缨花的精神姐妹),这显示出基督精神已经深入到作家的血液中,成了其无意识心理的组成部分。80年代许多作家受基督教的影响都有与张贤亮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自诩为唯物主义者,但在他们看来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基督教却在其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投影。王蒙、王安忆等作家受基督教的影响也呈现出这种情况,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五四时期,陈独秀曾经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说:“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可以说,五四先驱们从基督教借用思想资源以改造国民性的设想,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实现并得到了巩固。基督人格由先驱者从异邦求来的新声逐渐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血脉,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这应该看作基督教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最深刻的影响之一。

参阅罗章龙《非宗教论》,18~19页,成都:巴蜀书社,1989。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50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鲁迅文集》第2卷,15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8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拉撒路,《圣经》中的人物,原为讨饭的乞丐,死后被耶稣救治复活。在后世基督教传统中,成为病人的守护神。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七卷第三期。